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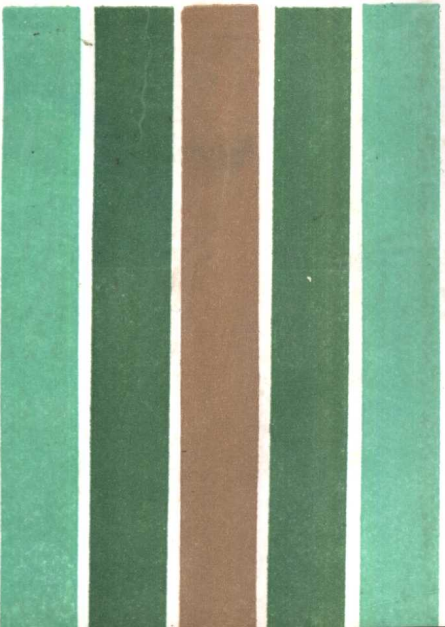
现代文学 批评史

1750—1950

第五卷

1900—1950年的
英国文学批评

(美) 雷内·韦勒克 著
章安祺 杨恒达 译



文学批评史

1700—1950

第五卷

1900—1950年的英国文学批评

〔美〕雷内·韦勒克 著

章安祺 杨恒达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雷内·韦勒克是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史家，“新批评派”的集大成者，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主要代表。1903年生于维也纳，1926年在布拉格获博士学位。先后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布拉格大学、伦敦大学和依阿华大学执教，1946年起任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是西方公认的本世纪最博学和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代表作有《文学理论》（与沃伦合著）和多卷本《现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

第五卷和第六卷前言

VII

本书已经写了很久。这些年来，曾发表了几篇关于个别批评家的论文，散见于说明中所列的各种刊物。写作上述论文都考虑到书的整个体系，而目的就是要最终纳入这个项目。

在计划写20世纪前半期这段历史时，我很快就意识到再照前四卷那样组织是不行的，前四卷从国家到国家自然推移：在第一卷中，从法国到英国，而后再到意大利和德国；第二卷，从德国回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而后又到德国。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论述不同国家的章节都是按照论述法国批评的章节来设计的，从最初的比较文学历史学派到象征主义者。

但是，愈益明显的是：20世纪初期，英美世界已摆脱了它同欧洲大陆——实际上是同法国——早先那种联系，彼此间的交流也已微乎其微。当然，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西班牙的批评界，也几乎全然无视英美人士。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彼岸的情况倒并非完全如此暗淡。欧洲大陆的作家、哲学家和美学家，而不是批评家，开始左右英国和美国的文学批评。马克思赫然耸现，尽管在大量的社会批评背后几乎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内容。在美国，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能够讲述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还曾有过一阵短暂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风潮。两位英国批评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和拉尔夫·福克斯，都在西班牙国内战争中为共和国战斗而牺牲。弗洛伊德和追随其后并颇具独到见解的卡尔·荣格，开始影响文学批评。不仅是宣称信奉精神分析这种方法的作家，而且还

VIII 有偶然听到关于性欲的作用、无意识、梦等很一般的想法，以及诸如俄狄浦斯情结、压抑、集体无意识和原型之类概念的人们，也都开始出现在批评舞台上。在英国，柏格森曾一度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尼采，主要作为道德主义者或反道德主义者，也在此背景下赫然呈现。但是，欧洲大陆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家事实上仍鲜为人知。

可以作为例外的是法国反浪漫主义的论争者，如彼埃尔·拉塞尔和颇具独到见解的于连·邦达，他们均为托·厄·休姆、托·斯·艾略特、赫伯特·里德等人所熟知，而在美国欧文·白璧德也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理论家和宣传员，而并非文学批评家。只有托·斯·艾略特和艾兹拉·庞德，与法国真正的批评家莱米·德·古尔蒙和拉蒙·费尔南德斯有过联系。贝内代托·克罗齐的影响，尽管常常难以详细描述，但却最为重要，他早年写的《美学》于1907年翻译出版。这似乎是他在当时唯一有些影响的著作。在美国，克罗齐的忠实阐释者是乔尔·E. 斯平加恩；而从英国哲学家罗宾·科林伍德的美学著作《艺术原理》（1934）及其史学论著中，也可看出克罗齐的影响。在50年代之前，同时代的俄国和德国批评家在英语世界里完全无人知晓。因此，与英国和美国的批评分开来专论述欧洲大陆，看来是必要的，也完全是合理的。

由于研究课题的数目超过了一卷书的适当规模，所以决定将这部著作分为两卷：英国批评作为第五卷，而美国批评则为第六卷。确实，人们可以提出有力的论据来说明这两种传统在本世纪内关系密切。这从下述事实可以得到最清楚的证明：两位美国人——艾兹拉·庞德和托·斯·艾略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来到英国，他们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英美两国后来的批评，而且在本世纪趣味的转移和理论的变革之中成了核心人物。一位给他本国和美国的批评界都曾留下深刻印象的英国人——艾·阿·

理查兹，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度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1943—63）；而乔·威尔逊·耐特在回到他的本土英国之前，在多伦多大学当了九年（1931—40）英语教授。其他英国批评家到美国来至少是在暑期学校中做临时讲师和教员（如威廉·燕卜苏、赫伯特·里德），或象弗·雷·利维斯那样，进行有组织的讲学旅行。如象戴·赫·劳伦斯这种非学者型的人物，在美国西南部也度过了很长时间，但他踏上这块国土之前已经在写关于美国文学的著作了。

IX
这种往来也通过另一条渠道进行：除去那些决定留在欧洲的人之外，如艾略特、庞德和桑塔亚那，我们不应忘记多年在英国学习对美国的罗得斯奖学金获得者们（约·克·兰塞姆、弗·O·马西森、克林斯·布鲁克斯、罗·潘·沃伦）必定会产生的作用。还有些人晚年作为访问教授（阿伦·泰特、R.P.布莱克默、利昂纳尔·特里林）在英国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当然，美国的一些学生和教授也曾热心访问英国，并且经常出入和利用其图书馆。由于生活富足和旅行便捷，20世纪的流动性使得这些接触比以前各个世纪都更加频繁，不过即使没有人员联系，两国间的书籍交流也很迅速，而这对确立和保持声誉名望常起决定作用。英国书籍按常规往往是出版一年之后便以美国版面世，而美国书籍交给英国出版社的则较为少见。对这些交往的研究可以说许多差异和偏私，但是也能表明国际书籍行业怎样成为批评思想传播的主要工具。

尽管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另一方面谁也不能否认本世纪前半期英国和美国的批评确实是独自发展的。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以1910年为例，是完全不同的。在英国，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开始处于支配地位，学术标准由文雅的鉴赏者来掌握。在美国，新闻批评掌握在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和美国商业文明的评论家手中，他们赞赏自然主义小说，抨击作家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在大

学里，沉闷乏味、实际存在的学术标准居于统治地位，尽管处处遭到新人文主义者的诘难，新人文主义者从阿诺德那里汲取灵感以维护古典的文学遗产。这两种传统至少到新批评派出现时是有着深刻差异的，而且即使在这以后二者区别仍然非常明显。利维斯等人在英国的影响在美国引起了微弱的共鸣，而象伊弗尔·温特斯或者肯尼思·伯克这类人物的影响却仍然限于美国本土。在美国批评家之中，只有爱德蒙·威尔逊在英国取得了成功，而且荒唐的是，在许多问题上他竟被描绘成激烈的反英派。在撰写英国和美国的批评史时，必然要按各自独立的体系来阐述，即使这两种传统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

这部批评史的前几卷书后都载有大量的附录，这是由于决定
x 在注释中印出所有引语译文的原文，这些引语分别译自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和丹麦文。鉴于这新的两卷中全部引语都是英文，所以不再需要那么大篇幅的附录。我仍坚持为每段引语提供详尽的出处，因为这部史书的要求之一，就是要建立在对所引用的每部著作都经过确凿查证的基础上，不过现在我尽可能在正文中注出所引著作名称的简写，而不用字角标码来指代排在书末的注释。如果出处文字较长并会有碍行文连贯，则仍然在大为缩减的注释中提供所引文献^①。

文献目录列出了所引用的著作及其简称，以及高度精选的对所涉及作者或题目的少数评论。今天，文献信息的来源是如此之多，如象年刊《现代语言学会文献目录》，以致于似乎无需列出每个项目。选择是集中在对所涉及作者的文学批评的评论方面。不过，如果文献目录和总的论述对学习批评的学生有用，有时还

^①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译者将书后的注释改为脚注，并在引用著作的简称首次出现时以脚注标明所引著作的名称。精选文献目录仍留书后。——译者

要将其包括进来。

几年以来，朋友们提出过一些建议和批评。有的人还读过部分原稿，或者对发表的文章做过评论。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朋友及合作者奥斯汀·沃伦的帮助，感谢小劳里·纳尔逊、巴尔巴拉·罗斯克兰斯，以及读过我论托·斯·艾略特那章的匿名读者的帮助。

几年来，承蒙各机构之恩惠，资助我的写作计划。我要向古根海姆基金会表示谢意，该会曾授予我1966—67年度三等研究基金。1969年春，我曾作为富布赖特基金会的讲师，在德国讲授美国批评。1972年我从耶鲁大学退休以后，自1972年至1973年，我任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1966年、1969年和1977年，我曾三次应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到贝拉吉奥讨论研究中心做一个月逗留。1977年，我任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也要感谢我曾利用过的图书馆。没有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大力协助，本书是无法写成的。有时我也求助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在圣地亚哥、里弗赛德和圣巴巴拉等分校的图书馆，以及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依阿华大学、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还有伦敦的英国图书馆、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美因茨大学图书馆、亚里山德里亚图书馆和罗马大学图书馆。

理应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我的编辑埃伦·格雷厄姆和杰伊·威廉斯的关照，还要特别感谢克里斯托弗·勒梅林，他编制了本书的两个名目索引。

XI

雷内·韦勒克

1985年4月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我采用了我的下列文章，有的做了扩充、删节和改动。

导言：《对我的〈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反思》，见《描写诗学和文学理论杂志》第3期（1977），第417—427页。转载于《对文学的抨击及其他》（1982），第134—145页。又见于《1976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会刊》，布达佩斯，学会出版社（1981），第439—447页。

《安·西·布雷德利、莎士比亚和上帝》，见《从乔叟到吉本：纪念柯特·A.齐曼斯基文集》（1975），第85—103页。又见于《语言学周刊》第54期（1975），第85—103页。

《作为批评家的弗吉尼亚·伍尔芙》，见《南方评论》第13期（1977），第419—437页。

《戴·赫·劳伦斯的文学批评》，见《斯瓦尼评论》第16期（1983），第598—613页。

《艾兹拉·庞德的文学批评》，见《丹佛季刊》第3期（1976），第1—20页。

《托·斯·艾略特的批评》，见《斯瓦尼评论》第64期（1956），第398—443页。

《关于重读艾·阿·理查兹》，见《南方评论》第3期（1967），第533—554页。

《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见《文学展望：批评的和历史的文集》，卡罗尔·卡姆登编（1964），第175—

199页。又《晚年的利维斯》，见《南方评论》第17期（1981），第490—500页。

《F.W.贝特森的文学理论》，见《批评文集》第29辑（1979），第112—123页。

我从历史编纂学的大量新文献中看到，这一学科至少在英美世界是由分析哲学的方法所支配，而我对此感到失望，因为所有这些专著和论文分析的课题，与批评史的写作实际上都关系不大或者毫无关系。这些论述大部分都涉及道义上的责任或处罚的问题，涉及人们正常或反常的行为，涉及象突然死亡和暗杀之类的事件。我们要去考虑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布鲁图为什么刺杀凯撒？”或者“路易十四为什么死得无声无息？”甚至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真正属于批评史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到别处去获取与此相关的东西和可以接受的模式。

显而易见，批评史同政治史、社会史或经济史的深刻差别突出表现在：批评史所依据的本文可以直接得到，并且可供阅读、评论、解释、争辩，而本身也可供批评，就象它们写于昨天，尽管它们也许写于大约2300年前，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因此，批评史不是我们所写的——比如象战争史——那种意义上的历史。再现滑铁卢战役的情景，必须根据有记载的目击者的第一手叙述，根据已成文的军事命令或战斗布署，或者也许根据某些确实确实的遗迹；而象荷马和柏拉图的本文却是现成的，正如帕台农神庙或者阿雷那小礼拜堂里乔托的壁画也还存在一样。而且，批评史也不同于艺术史或音乐史或诗歌史，它不负有必须从一种媒介（或者按现在时髦的说法：从一种语言或符号）转化为另一种的义务。编写批评史，我们使用而且必须使用同样的语言

(即使译自古希腊语), 使用概念性的语言。简而言之, 批评史所提出的问题与各种思想史是相同的: 哲学史, 美学史, 政治、宗教和经济的思想史, 语言学和其他许多门学问的历史。

这样, 我们便有了一些依傍和样板。遗憾的是其他批评史中可学的东西并不多。在我这本书之前, 只有乔治·圣茨伯里于1901—1904年出版的那部通史, 才是关于文学鉴赏的一部深思熟虑非推理的、凭印象的历史。圣茨伯里指责“在探求诗的本质和为诗辩护等抽象问题上那些胡思乱想的谬误”^①, 但却几乎从不对他的写作方法进行反思, 而只是为我们提供一种图式和概貌。从R.S. 克莱恩对J.W. 阿特金斯的著作《英国文学批评: 17和18世纪》(1953) 所作的评论中, 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克莱恩否定了阿特金斯对理论学说的总结概括, 而要求对具体的本文按年代来进行分析, 想要一种“无须先认定批评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历史”, 一种“没有论点”的历史, 我认为这是个不可能达到也不希望达到的目标^②。 XVI

关于哲学史的写法, 说得已经比较多了。人们可以描绘出哲学史编纂学的发展轨迹, 从公元3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 到18世纪雅各布·布鲁克的概要(1742—1767, 五卷)和威廉·戈特利布·坦尼曼的12卷书(1798—1817), 到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1833—1836年出版, 但有时也根据手稿和学生的抄本将年代标回到1815—1816年)。黑格尔之前的所有哲学史都可称为学说志, 即哲学家们学说的总览和展示, 其编排或者按学派(柏拉图派、怀疑论派、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等等)或按年代, 力图做到不偏不倚客观描述, 尽管不难发现布鲁克的莱布尼兹倾向, 或者坦尼曼的康德倾向。在黑格尔那里, 哲学史的整个

① 见乔治·圣茨伯里的《批评史》第3版(1908), 第1卷, 第36页。

② 见R.S. 克莱恩的《J.W. 阿特金斯〈英国文学批评: 17和18世纪〉》, 载《多伦多大学周刊》第22期(1953); 重印于《人文科学的理想》(1967)第2卷。

观念彻底地改变了。黑格尔在他的导言中坚定地说：“一门学科的历史紧紧地依赖于人们对该学科所持的观念。”他承认，哲学（而对批评来说尤其如此）“同其他科学相比更有其不利，这是由于人们对哲学应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的看法最为分歧”。但是，黑格尔异乎寻常地卖弄着干巴巴的俏皮话说道，那些抱怨哲学表述方式多样性的人，就象那种医生劝他要吃水果，而他却不肯吃樱桃、李子和葡萄的人一样。“如此说来，多样性对哲学的存在并不会造成损害，相反地倒是绝对必要的。所以，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本身。”哲学的多样性不能理解为一种偶然的关联，而应看作是“一种发展的有机整体，一种合理的延续”。哲学的历史，是“一种必然产生的、首尾一致的进程”。每种哲学都是必然的。没有一种曾完全消失。最新的哲学——这他是指他自己的——是“先前所有哲学的结果”。黑格尔阐述了这样一个似非而是的论点：“在哲学史中，虽然它是历史，但我们却不必讨论任何过去的事。”他说：“真理根本没有历史，不会成为过去。”^①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历史学家的权利和义务是判断，是确定哪种思想才属于发展的链条。黑格尔《哲学史》导言中的意见今天仍然是中肯的，对批评史家来说也是如此。

他们提出了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否存在“批评”这样一门可以同人的其他活动相分离的学科，以及它是否具有某种整一性、集中点和连续性？对这两个问题，我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尽管象贝内代托·克罗齐在其早年的小册子《文学批评》（1894）中，以及艾里希·奥尔巴赫在对我的《现代文学批评史》头两卷的评论中，都曾否认批评是门独立的学科，因为“潜在的问题不

^① 见格奥尔格·黑格尔的《文集》（理论著作版）（1971），第18卷，第16、19、37、20、55、57、24页。

胜枚举，许多问题又互相交叉，而其先决条件、目的和特征也极不相同”^①。我甘愿回答说，任何对文学的评论都是批评。因此，正如其他许多科学那样，按其主题便可予以明确的定义，至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方法恰恰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它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界定和考察该学科的各种途径进行清理。批评、文学和诗歌诸概念的沿革正好是本书的核心。

克罗齐和奥尔巴赫只看到了樱桃、李子和葡萄，却似乎是否认水果的存在，而其他历史学家则试图取消水果与整个植物界的区别，或者不用比喻说法，就是取消文学批评与其他批评如美术批评和音乐批评之间的区别，甚至否认批评除了作为通史的一个分支外还可以探讨。明明存在着无可争辩的真理，即：现实结成了一张无缝的网，人的任何活动都同他其他的所有活动紧密相连。文学批评关系到文学史和其他艺术史，关系到思想史，关系到政治史或社会史等通史，甚至经济状况也能发挥用来左右批评史的进程。人们一直试图使批评真正成为特定时代和地点的一面镜子。于是，伯纳德·史密斯在《美国批评的实质：美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强调指出：“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与诗歌和小说相比，和社会史的关系更为明显。”^②批评表现为“意识形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Weltanschauung^③——而是一种对现实的虚假意识，一种特定文学或社会思潮的纯粹喉舌。它与文化史融成为一体，成了文化演变本身的表现形式。我们碰到了决定论的整个议题，面临着这样一种观点：“处理每件事都不仅要把它同其它一切事联系起来，而且要将其看成其它某些事的表

XVIII

① 见艾里希·奥尔巴赫：《韦勒克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载《拉丁语研究》第67期（1967），第387—397页。

② 见伯纳德·史密斯：《美国批评的实质：美国文学思想史研究》（1939）第Vii页。

③ 德文：世界观。——译者

征。”^①对这整个议题，我在别的地方^②已经讲过多次，这里只能复述一下我的结论。原因——按照莫里斯·R.科恩所规定的含义——是“每当先行事件发生必有后承事件继起的某种理由或根据”^③，这在文学史或批评史中是不适用的。一部作品也许是另一部的必要条件，但不能说它是它的原因。必须承认，某些事应属于人的自由，要由个人决定。但在这方面，我们无需如此抽象地继续探讨。

作为一个批评史家，我必须努力描述批评对人的所有其他活动的关系，而不放弃对中心课题的关注。批评与写作实践的关系必须永远记在心里。也时常有人是诗人兼批评家，这在英国文学中最为突出，如德莱顿、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马修·阿诺德和托·斯·艾略特等诗人，也是批评史上的里程碑。许多评论是专门为一种文学思潮或学派辩护而写的。我只需提一下施莱格尔兄弟是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或者俄国形式主义者是未来主义的辩护人就够了。批评与美学密切相关：正如克罗齐所论证的，批评也许只不过是美学的一个分支，而我确实也论述了如象康德、席勒、谢林、罗斯金和克罗齐等作家，虽然我尽可能避开关于美和美感的抽象思辨。批评深受哲学的影响：18世纪英国批评家的经验主义，与浪漫主义时代德国批评家的唯心主义，有时还是神秘主义的假想形成对照，正象他们也不同于法国19世纪后期的实证主义者一样。当我论述拿破仑驱逐的斯塔尔夫人，或自由主义思想的鼓吹者格奥尔格·布兰代斯，或19世纪60年代俄国激进派批评家的反沙皇热时，我不能无视政治史对批评的冲击。我的确有时也想到批评的经济基础，想到批评家们不同的阶级出身和对

① 见厄恩斯特·冈布里奇：《文化史探源》（1969）第31页。

② 见雷内·韦勒克：《文学史的衰落》，载R.科斯基克和沃尔夫·迪特尔特·斯坦普尔合编的《历史：事件与故事》（1973），第430—436页。

③ 见莫里斯·R.科恩：《人类历史的意义》（1947），第102页。

阶级的忠诚。19世纪早期的德国教授们(包括黑格尔在内),在生活方式上显然不同于波德莱尔那种巴黎的颓废派文化人,或者俄国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那些战斗的报界人士。

所有这些只好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引自黑格尔的那些话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批评当作是相对独立的活动。任何一门学问,如果不认为它处于相当隔离的状态,如果不将其它所有东西,用现象学的术语说,“圈在括弧里”,就绝不会取得什么进展。这种隔离当然不是说要为批评而批评,这也是一条讲究实际的必要规则。一部著作即使篇幅很长,也必定有一定限制。假如我要论述批评与文学实践的关系,我就必须考查比如席勒的所有悲剧,或者调查华兹华斯是否真的用人们的普通语言写诗。我很快就会丢掉论题的整体性、它的连续和展开,并且将使批评史融化为文学本身的历史。只有界定学科范围,我们才有希望来驾驭它。

然而,怎样才能驾驭它呢?怎样才能使我们必须涉及的基本事实与今天尚存的本文相符合,而且仍把它们看作过去的一部分,看作历史呢?人们会论证说根本没有批评史,甚或没有文学史。沃·巴·凯尔曾经说过,文学史家就象博物馆的讲解员指点并评论那些图片一样,而贝内代托·克罗齐则在多处宣称,艺术作品是独特的、个别的、直接出现的,并且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实质上的连续。就批评而言,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问题今天仍然伴随着我们。与我们有关的是W.B.伽利透辟地称之为“本质上有争议的那些概念”^①。我们可以选取这样一些概念,如“摹仿”、“悲剧”、“形式”、“净化”,涉及《诗学》中几个关键性术语,并就它们进行讨论,好象它们是昨天才提出来的。我们可以问:它们是否确切?它们有无道理?如

① 见W.B.伽利:《哲学与历史的理解》(1958),第153页以下各页。

何将它们应用于今天的文学？我也认为有些永久性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亚里士多德、康德、柯尔律治、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托·斯·艾略特和其他人提出的问题我们要回答，而这些问题往往是相同的，虽然表述方式常常有别，是用新的词语。批评史的作用之一就是向读者表明，那些一向被吹捧为新发现的东西以前早就讲过许多遍了。现代批评可以说是老问题不断被重新发现的过程。但是，新的历史循环论已对永久性问题这整个观念提出了异议。据说，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不是没有时间性的，而是受时间限制的，他所理解的“悲剧”与我们的理解很不相同，因为他只知道希腊戏剧。每个批评家都在他自己的时代写作，受他自己的时代限制。我想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轻易地接受无时间性概念是危险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含义的变化，而不因出现相同的词汇和短语而受骗。但这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如说是向史学家的挑战。我无法相信高深莫测的过去，无法相信时代精神的封闭式循环，这种循环是按照黑格尔主义，按照象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或许多有其“中世纪心灵”或“巴罗克人格”的德国思想史之类派生物，构想出来的。

XX

我自己也写过几篇有关历史语义学的论文，这多少是仿效利奥·施皮策对于象“情调”和“环境”这类词的研究，还写过些论文讨论批评的概念、文学、时期、演变和五个时期的名称：巴罗克风格、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但是，我放弃了围绕单个概念或“单位思想”的踪迹来组织我这部史书的打算，这个打算按阿瑟·O.洛夫乔伊的“思想史”的特定方法是可取的。它会破坏批评家们个人的体系，这些体系无疑地经常是组合松散并相互矛盾的；它会使人无法领会批评家们的个性和人格（这当然不应作为传记术语来理解）。我们要当心彼得·盖伊所谓的“荒谬的永久性那个陷阱”，但也要坚信即使是遥远的时代和作家提出的概念和课题我们也能理解。错误的二难推理